

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科学把握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郭春丽

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要有正确思想和政策,而且要有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并针对经济工作的新情况作出完善。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体现了对“稳”和“进”、“立”和“破”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为做好2024年经济工作提供了科学遵循。

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要求

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是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要求。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要把握好经济工作总基调,切实增强经济发展动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路径。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新动能不断积蓄,新产业发展壮大,是一个爬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地要结合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特征和产业发展基础,充分考虑新旧动能转换的速度和节奏,既要防止旧动能退出过慢、挤占新动能发展空间而导致经济发展进程缓慢,又要防止旧动能退出过快、新动能不能及时接续而造成负面影响。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统筹协调、有序推动新动能发展和落后产能退出,在高新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动能全面壮大之前,资源型产业等传统动能不能过快退出。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持续扩大释放内需新潜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必须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在经济平稳运行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必然选择。当前,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相互关联,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金融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风险源。统筹化解风险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以房地产市场的“稳”来支撑和推动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的“进”,以建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进”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要在“稳”的前提下,加快推进重点地区风险出清和中高风险平台处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要尽快建立健全市场化、法治化、规范化的全流程干预处置机制,在稳

定大局的前提下扎实稳妥化解风险,避免风险集中暴露和交叉感染、引发更大范围的系统性风险。

稳定社会预期的现实要求。眼下,我国社会预期依然偏弱,企业存在不愿投、不敢投现象,居民消费意愿不够强,成为制约经济回升向好的关键问题。预期的形成是经营主体接受外部信息不断调整先验判断的学习过程,也是自我实现的正反馈过程。为改善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就需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以重大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来稳增长、促发展,增强各方对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趋势的信心和底气,激发民营企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增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信心,提升居民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的信心和能力,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预期偏弱的局面,形成“社会预期改善—经济回升向好—信心动力增强”的良性循环,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把握辩证关系是关键所在

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把握好“稳”和“进”、“立”和“破”的辩证关系,是当前做好经济工作的关键所在。

把握好“稳”和“进”的辩证关系,以“稳”为基础推动“进”,以“进”为动力实现“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这阐明了“稳”和“进”的辩证关系。稳是大局和基础、进是方向和动力。只有把握“稳”的关键点,找准“进”的切入口,处理好“稳”和“进”的辩证关系,着力夯实“稳”的基础、持续增强“进”的动能,才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当前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仍然是恢复性的,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要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在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上谋“进”,稳住宏观经济大局,稳住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稳住能源等初级产品供给,在经济回升向好、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为“进”创造良好环境。与此同时,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质量、推进重大改革等方面的“进”,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把握好“立”和“破”的先后顺序,该“立”的要积极主动地“立”起来,在“立”的基础上坚决地“破”。“立”和“破”是辩证统一的,在“破”与“立”中前进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但在逻辑顺序上有“先破后立”和“先立后破”两种工作方法。强调“先立后破”,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坚决“破”,可以更好兼顾当前和长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立”字当头、“先立后破”,也是更好实现“稳”和“进”的重要方法,这对仍处于经济恢复关键阶段的我国而言,尤为重要。旧动能退出必须建立在新动能成长壮大之后。无论是化解风险、调整政策还是推动改革开放,都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影响社会预期。

明确需推动的重点工作

在深化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要找准工作重点,继续夯实“稳”的基础、更多激发“进”的动能,先立后破,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一是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谨慎出台收缩性、抑制性举措,发挥好宏观政策空间大的优势,营造宽松适度的政策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用好增发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适度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更好发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循环的作用;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增强政策精准性和针对性,加强对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支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协调,确保协同发力、增强合力,避免出现合成谬误、分解谬误。

二是推动新旧动能有序转换。要将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主战场。一方面,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另一方面,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同时,要做好安全发展这篇大文章,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行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三是推动消费与投资良性循环。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家电等大宗消费,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以消费扩大方向确定投资的重点领域,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优化投资结构和扩大投资空间。同时,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中挖掘内需潜能。

四是积极主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完善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稳妥处置房企风险,实施好“三大工程”建设,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建立“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新机制。加大存量隐性债务化解力度,坚决防止新增隐性债务,健全化债长效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完善金融风险防范、预警和处置机制,加快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建设,有序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统筹风险化解与稳定发展的关系,债务风险高的地区要边化债边发展,在债务化解过程中找到新的发展路径;债务风险较低的地区要在高质量发展上能快则快,特别是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五是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提振社会信心、强化社会预期。聚焦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重点领域,包括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谋划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稳定预期和强大动力。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张颖熙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加快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是有效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有效手段,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以内需催生优质供给,以供给创造新兴需求,在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上下功夫。

正确认识消费和投资的关系

从需求侧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简称消费、投资、净出口。其中,消费和投资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消费和投资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消费扩大能够促进投资增长,投资增长也能够激发消费潜力,消费和投资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我们要正确认识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协同发挥好消费和投资的积极作用,实现消费和投资“1+1>2”的良性互动。

消费与投资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从微观层面看,企业作为生产主体,扩大生产必须有消费需求的牵引。消费需求的扩大会引发相应的生产需求,进而带动企业生产和投资的增长。从宏观层面看,社会生产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生产资料的需求往往是从生活消费需求中派生出来的。没有消费需求的生长与升级,投资和社会生产会陷入低效重复甚至过剩状态。另一方面,投资是形成生产能力的工具 and 手段。投资是形成生产能力的必要前提。要维持简单再生产,就必须及时进行固定资产更新改造;要扩大生产能

力,就必须持续追加新的投资;要满足消费需求变化与升级,就必须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没有新增投资,就没有资本的增加,没有资本形成,就没有生产能力扩大和新的产品供给,消费需求的扩大也就失去了源头活水。因此,投资结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之间要始终保持一定的适配性。

消费与投资要产生联动。消费和投资之间要产生联动机制,形成联动效应,才能实现两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一方面,要发挥消费对投资的引导作用。消费需求发展将提升企业扩大生产的意愿和政府增加公共设施服务的必要性,进而引导和拉动相关领域投资增长。另一方面,要提升投资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扩大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但应避免重复、无效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需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结合起来,以有效投资创造与终端消费需求相适应的供给,激发消费潜力,形成消费新增长点,以有效投资带动居民就业和收入增长,提升社会消费能力。

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有潜能的消费”与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所展现出的潜在需求和能力息息相关。深刻把握消费方向与趋势,聚焦消费主力群体、培育消费新热点和亮点是激发消费潜力的三个重要落脚点。从消费趋势看,当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已逐渐从注重数量转向追求质量,以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从以物质型消费为主转向以服务型消费为主。我们要顺应这种消费形势的变化,突出品质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设计导向,引导经营主体积极投资新产品、打造新场景。从消费群体看,既有强烈消费欲望,又有支付能力的社会群体是释放消费潜力的有力支撑。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

消费者,对产品的时代性需求更强,对消费的选择也更加敏锐且富有个性。这种对性价比和品质的独特青睐带来了“国货平替”消费潮流的崛起。我国近3亿的老年人口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潜在老年消费市场。多层次、多样化的庞大养老消费需求将会激发旅游、康养、照护、慢病管理领域的广泛投资,孕育出银发经济新蓝海。从消费热点和亮点看,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兴消费的不断涌现会激发新的投资热情,优化投资结构,引导供给从生产端符合型向消费端适配型转变。

实现有效益的投资

“有效益的投资”指的是有质量、有效率和有回报的投资。“有质量”强调的是不断聚焦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的精准投资,锚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降碳等领域投资力度,培育新动能。“有效率”重在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作用,鼓励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科技创新项目、重大补短板项目、重大示范项目,放大政府投资的“挤入效应”。“有回报”重在围绕有潜能的消费需求展开投资,推动资源和要素的合理配置,既要兼顾短期稳增长、长期活力的政策目标,又要兼顾惠及民生、保障安全的预期效果。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务必要结合消费趋势,加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领域的投资,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方面的标准为牵引,继续实施免征车辆购置税等优惠政策,为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消费营造良好环境,扩大新能源产业链投资。以发展“文旅+科技”模式为路径,创新文化旅游运营模式,加大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投资力度,以科技赋能行业创新发展。以高效率、高性价比等消费理念为引导,鼓励国货“潮

品”等自主品牌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鼓励零售业积极拓展下沉市场,带动仓储物流等消费基础设施投资。

形成有利于良性循环的体制机制

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必须破除一切阻碍形成良性循环的体制机制,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挥扩大有效需求的协同作用,确保宏观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只有不断调整供给结构,转变投资和产品方向,才能激发出内需潜能,这是解决供求错位、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关键。在我国发展现阶段,畅通经济循环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因此,我们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

以政策组合拳推动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要完善产业政策,针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文娱消费等新兴消费热点,进一步明确行业监管规范,释放新兴消费活力。加大财税支持力度,继续实施一批支持绿色发展和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严格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增强融资支持力度,适度超前部署消费基础设施投资,着力提升投资效益,加快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展,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乘势而上,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各领域数字化优化升级。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交往方式,人类正加速迈向数字社会。我们在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有所凸显。增强包容性,消除数字鸿沟,是推动数字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加强包容性数字社会建设,是数字化时代加快释放数字红利、激活社会活力、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必然要求,也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多方参与、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增强全民数字素养,拓展多维数字参与格局,提升数字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推动数字社会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段忠贤

一是形成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社会合力。在今天这样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时代,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中人们学习生活工作具备的一系列素质与能力,包括数字意识、计算思维、数字化学习与创新、数字社会责任等。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当前,数字鸿沟问题已经从数字工具和技术可及性的机会差距逐步演变为在数字环境中获取、评估、使用信息的能力问题。由于发展不平衡,导致数字素养分布存在非均衡状态,在不同区域、群体之间出现了发展能力差距。在一些欠发达地区,数字技术赋能和技术赋权效应依然较低,人们的数字空间较为狭窄,需要尽快提升人们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更好消除数字鸿沟。全面实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教育是基础更是关键。要在教育体系改革上下功夫,结合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受教育人群特征,将数字素养培养纳入教育教学大纲,设置与数字时代需求相适应的课程体系。不仅要让学生充分体验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实践场景,更要培养学生的数字思维和数字技能。当然,全面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多方协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媒体、企业、社会组织等要充分发挥各自的社会职责,用好自身比较优势,找准着力点和发力点,积极参与到增强人们数字意识、推动数字技能普及、提高全民数字素养的活动中,推动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合力。

二是积极拓展更为开放的多维数字参与格局。有序扩大数字参与,有利于更好满足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实际需求。只有全社会都拥有平等的数字参与机会和畅通的数字参与渠道,才能够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包容性数字社会。要从法律制度层面入手,研究制定和完善面向数字市场的法律法规,确保中小企业在数字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为推动区域间的协同发展,在实施好“东数西算”工程基础上,应积极探索东西部之间的数字协同发展互补模式,推动东部先进经验、技术、人才等资源向西部转移,在帮扶中开拓新的数字市场,不断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实现数字社会发展的普惠性和公平性。数字社会人人共建,数字生活人人共享。应拓宽人们参与数字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有效机制,让人人都是数字社会发展的受益者和数字社会治理的参与者。此外,多渠道的数字参与当然重要,但是过多杂乱的同类参与渠道必然会导致资源的浪费,有必要对一些数字参与平台渠道进行整合和创新。要在线上与线下之间寻找平衡,更好确保各种数字参与渠道功能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

三是全力推进数字治理能力建设。数字治理作为包容性数字社会建设的关键环节,已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议题。数字治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社会治理水平。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在带来智能化、便捷化、高效化服务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数字风险和管理真空,产生各种不可控和非正常风险。推动数字治理能力建设是大势所趋。要充分利用和创新发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积极发挥其社会效益与技术效应,不断降低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的信息成本、时间成本等,为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数字治理不仅强调技术和工具的运用,还应强化对数字技术本身的治理。对于政府而言,不仅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不同类型群体数字需求特征,研究制定保障特殊群体数字权利的相关措施,让人人都能分享数字社会的发展红利,还要建立健全数字治理机制,加强数字监管,探索与区块链、网格化等相匹配的数字治理规则,为数字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障。

(作者系贵州大学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副主任、教授)